

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决防止和纠正就业歧视，多位代表委员呼吁——

打破35周岁职场门槛 保障就业平等

两周前，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询问刘伟，是否有跳槽的意愿，工资可以给到现在的两到三倍。再三思考之后，在北京市某事业单位工作的刘伟，决定放弃这次机会。

“我今年34岁了，即使跳槽后年薪能给到现在的3倍，但还是觉得不放心。最近这几年，很多企业裁员比较厉害，如果被裁后再找工作，我连35岁这个就业门槛都迈不过去。”刘伟说。

刘伟担忧的35岁就业门槛，也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关心的问题。

连续两年提出相关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、温州大学研究员蒋胜男直言，35岁的隐形年龄歧视，在职场其实一直存在，“这条限制不仅针对职场，更影响结婚率、生育率、职场投入度、职业规划等方方面面，其实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”。全国政协委员、合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洪明基呼吁，相关部门通过立法方式惩治“35周岁就业歧视”行为。

招聘设置年龄门槛普遍存在

春节过后的三四月份，往往是招聘旺季。然而，对于不少35周岁以上的求职者而言，这个旺季的感受并不明显。

智联招聘近日发布的《2022年春风行动招聘市场行情周报（第二期）》显示，将“年龄原因”作为求职难原因的人数占比，随着工作经验的增长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。工作10年以上的求职者，有56.9%认为“年龄原因”造成了求职困难。

“通常而言，除非有经验丰富、资源丰富、成果丰硕等显著优势，否则的话，超过35周岁再求职就会特别难。以高校为例，超过35周岁后如果还想进入高校任教，除非是从其他单位调过来且成果丰硕的人才，否则很难进来。而这种现象，几乎存在于各行各业。”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煜华说。

正如孙煜华所言，“35周岁限制”的现象，存在于众多行业。不仅报考公务员要求“18至35周岁”，许多高校、事业单位的招聘公告上也都标有“不超过35周岁”。而大多数企业在招聘时，或是明文规定了35周岁的年龄限制，或是在暗地里遵守这一规则。

洪明基回忆道，自己30年前回国创业时，基层的年轻干部年龄分界线是35岁以下，然而，30多年以后，经济水平日新月异，但衡量人才年龄的标准却停滞不前。

多重原因导致“35周岁限制”

近年来，“35岁之前是人力资源，35岁之后是人力成本”观念十分盛行。

孙煜华分析道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，知识更新速度也在加快，很多人都被这种快节奏淘汰。相对而言，年轻人的可塑性更强、服务周期更长，在知识更新和储备方面都更占优势。因此，雇主更愿意选择年轻的求职者。

“年轻人在工作上有冲劲，在生活上牵绊少，创新性、适应力、可塑性都要更强，对于薪酬待遇的要求也不是很高，这些都更受到企业的青睐。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互联网行业，这种情况更是明显，35周岁以下的求职者会更有优势、更受欢迎。”一位大型互联网企业的人力资源经理告诉记者。

一些代表、委员和专家认为，导致“35周岁限制”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制度层面的影响。

1994年实施的《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》明确，报考国家公务员，必须具备“年龄为三十五岁以下”的条件。2007年实施的《公务员录用规定（试行）》，沿用了这一规定。2019年修订的《公务员录用规定》明确，报考公务员，应当具备“年龄为十八周岁以上，三十五周岁以下”报考条件，修改为“年龄为十八周岁以上”。

在20多年的时间里，这一标准不仅成为公务员的报考条件，也逐渐被部分事业单位及企业在招聘时采用，久而久之，形成了现在的“35周岁就业限制”现象。孙煜华说。

在蒋胜男看来，“一刀切”地划定35周岁求职门槛，有些过于简单粗暴。近几年，一些企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经营状况不善，部分员工需要再就业，“这些人并不是因为知识水平跟不上才失去工作的。不少人经验、水平都不错，但找工作还是被35岁这道坎儿难住了”。

蒋胜男认为，如果因为年龄限制，就把这群人排除在职场之外，不仅是对人才的巨大浪费，也会让很多人担心自己到了一定年龄被淘汰，继而影响结婚率、生育率、职场投入度、职业规划等，这会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吕国泉认为，这种年龄限制具有不小的局限性，既不符合职工的权益，也不符合目前我国扩大就业、实施更加积极就业政策的大趋势，更不符合当下提高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政策要求，“现阶段的确应该有政策落地，对用工年龄限制进行调整”。

完善社保和再就业培训制度

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坚决防止和纠正性别、年龄、学历等就业歧视，大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。

多位代表、委员和专家认为，解决“35周岁就业限制”的问题，需要从立

法修法、社会保障、技能培训等多个方面入手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林勇认为，机关单位应发挥带头示范作用，探索放开公务员考试“35周岁限制”，对此，建议将《公务员录用规定》的“年龄为十八周岁以上，三十五周岁以下”报考条件，修改为“年龄为十八周岁以上”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上海市政府参事、上海中华职教社常务副主任胡卫在提案中建议，修订相关劳动法规，要求用工企业不得将年龄作为招聘、晋升或辞退的红线，并在各类企业中保证一定的40岁及以上人员比例。另外，可扩大公益性岗位安置，考虑在公益性岗位安置中明确40岁及以上人员比例，对部分社会经验要求较高的工作只向40岁及以上人员开放。

除了在制度层面对“35周岁就业限制”说不，还要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再就业培训制度，给求职者一个缓冲时间和学习机会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东风集团神龙汽车有限公司职工杨祉刚认为，“35周岁限制”现象的出现，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求职者自身能力还有些不足，还有成长和提升的空间。建议年纪稍大些的求职者特别是普通工人，要加强职业技能学习和培训，让自己有“一技之长”或成为行业里“一把好手”，这样职业生涯才能更加顺利。

“目前来看，当下最重要的是要尽量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，进一步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，让超过35周岁的求职者能够有一个‘安全网’和‘缓冲区’，让他们有更新知识的时间和机会。比如，可以出台鼓励政策让他们参加开放大学、技能型培训机构的学习，帮助他们掌握更新、更多、更精的知识技能，进一步拓展就业的深度和宽度。”孙煜华说。

据《法治日报》

开店4年，疫情占3年

我们如何挺过重重难关

“开店4年，疫情占3年，我们却越来越好”，85后夫妻徐超和黄丹英辞去杭州的工作，来到家乡湖州市德清县新市古镇开了一家咖啡店。如今，这家名为“企鹅咖啡”的小店，不仅是两人热爱的事业，还成了古镇的“热门打卡地”之一。

一二线城市职场人的刚需——咖啡，来到古色古香的江南小镇上，会有怎样的“奇遇”？徐超坦言，刚回到古镇时他们并没有想好经营什么类型的小店，“恰巧遇到巷子里有一家咖啡店在转让，我们就接手了”。

因为没有相关经验，他们把20万元启动资金几乎都用在了支付转让费、房租和装修上，“现在看来，投入硬成本太高，对于后期店铺资金运转并没有利处”。更让他们犯难的是，以前做广告设计和婚礼策划的两个人，对于咖啡相关专业知识并不了解。为了提高自己的能力，他们开始跟着视频资料、书本知识学习摸索，有机会还会去找同行请教经验。

好在，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咖啡店正式营业了。

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的新市古镇，虽然堪称古老之胜、水乡之美，但与40余公里外的“风头正盛”的莫干山风景区相比，仍是逊色不少。徐超对记者说，尽管外地游客少，但古镇及周边城镇的年轻人并不少，“因为新店带来的新鲜感，开店起初的生意还不错”。

但半年后，咖啡店生意开始走下坡路了。“一开始我们是甜品、咖啡、简餐等什么都卖，偏向于以前老式西餐厅或咖啡厅的经营路子”，察觉到生意下滑后，他们开始调整经营策略，停掉了利润不高和有积货风险的甜品等，把重点放在“走精品咖啡路线上”。

“在知道咖啡产品不‘抗打’后，我们把之前的老咖啡机、磨豆机陆续换新。客流量不大，那我们就开始研究咖啡技术”。徐超告诉记者，那段时间，他开始尝试自己烘咖啡豆，“根据客人反馈，让咖啡口味更加符合当地人的选择”。慢慢地，咖啡口碑传播出去了，客流量也再次大了起来。

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，再次让他们面临了困境，甚至一度考虑是否要放弃。黄丹英说：“如果连喜欢的事情都做不下去，那别的又能做什么呢？”因为

舍不得，他们又咬牙坚持了下来。

在徐超看来，他们是“不破不立”。景区解封后，他们再次调整经营范围：以售卖咖啡为主，也销售自己烘焙的咖啡豆和小镇周边纪念品。“小镇里喝咖啡的人少，那我们就去外面寻找”。于是，他们开始关注周边城市举办的各类市集，让更多人了解和品尝到他们的咖啡。

“第一次参加市集活动，我们的咖啡不仅销量不错，还收到许多好评，这让我们信心倍增。通过一次次市集活动，我们也提升了一定的知名度，还有人专程从杭州开车到小镇，找我们来打卡喝咖啡。”

去年年初，咖啡店的客流量一下子大了起来，他们也意外收到了来自客人对环境的差评。“因为没有招聘店员，店内大大小小事情都是两个人在做，加上要穿插参与各地的市集活动，肯定会有疏忽”，黄丹英坦言，客人的评价也让他们意识到，在注重品控的同时，不能忽略服务、环境等用户体验，“该改进的地方就一定要改进”。

如今，他们的咖啡店已小有盈利，也招聘了专职咖啡师。即便如此，徐超也会每天留心产品品质，“比如烘咖啡豆，我会根据湿度、温度等每天进行调整。无论是意式咖啡还是手冲咖啡，好喝才是最关键的”。

“或许我们在做一件很普通的事情，甚至周而复始地做着，但有一天发现，自己把普通的事情已经做得很厉害了，这就是我在自己岗位上找到的成就感。”开店之余，他们每周都会用镜头记录自己的工作和生活，剪辑成Vlog发布在社交平台，也收获了一大波粉丝。

社交平台小红书数据显示，2021年有关“咖啡店创业”的搜索量同比2020年增长311%，其中35%来自三线及以下城市，“回老家开家咖啡馆”的试水者越来越多。徐超和黄丹英也经常收到粉丝咨询，对此，他们提醒说：“除了要有前期房租、装修等费用支出的预算，也要考虑店铺运转经费；并不是设备等硬件好，就代表产品和服务也好，开店要考虑方方面面的用户体验。同时，自己也要不断学习，不断提升，最重要的是，产品才是核心竞争力。”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

舟岱大桥成为岱山驶入共同富裕“快车道”

记者羊荣江 通讯员赵白璐报道 自2021年12月29日12时通车，至2022年4月7日，舟岱大桥运营满100天。据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舟山管理中心统计，截至4月7日14时，通过舟岱大桥进出岱山总流量约69.5万辆车次，日流量最高峰达2.26万辆车次。

舟岱大桥开通第一天，在岱山岱东企业的任宏斌就从岱山自驾前往舟山本岛。现在，他真切地感受到，这条高速公路的开通，极大缩短了岱山至舟山本岛及省内各地市的距离，也悄然改变着岱山人民的生活。“大海不再是阻隔，舟岱大桥成为助推岱山经济旅游发展的‘新引擎’。”

迈入高速时代 共谱文旅融合和谐曲

舟岱大桥道路畅通，开着很舒服，高速服务也给力，比原来走渡轮节省了三分之一的时间。经常往返岱山和舟山本岛的货车司机陈敬光说道。

长虹卧波，一桥飞架。通过大桥出行，岱山至舟山本岛仅需半小时、至宁波仅需一小时。相比之前水陆出行的繁琐，高速自驾成为了沿线民众出行的新方式。

舟岱大桥ETC通行实行9折优惠，给予司乘看得到的实惠。自大桥开通，岱山自驾旅游热度持续攀升，旅游问讯不断。“东沙古镇怎么走？”面对司乘的提问，双面收费站微笑着解答，一步步指引着。如今，岱山至舟山本岛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，非常便利，运输成本也大幅降低。”大桥不仅圆了企业梦，也让创业者对进一步做大做强企业有了信心，未来三年，得法食品计划在宁波开30~50家分店。

得法食品总经理邬雄艳表示，大桥效应给企业带来了无限商机，“我们进军宁波，主要是基于舟岱大桥的通车。从岱山工厂到宁波市区也就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，非常便利，运输成本也大幅降低。”大桥不仅圆了企业梦，也让创业者对进一步做大做强企业有了信心，未来三年，得法食品计划在宁波开30~50家分店。

得法食品总经理邬雄艳表示，大桥效应给企业带来了无限商机，“我们进军宁波，主要是基于舟岱大桥的通车。从岱山工厂到宁波市区也就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，非常便利，运输成本也大幅降低。”大桥不仅圆了企业梦，也让创业者对进一步做大做强企业有了信心，未来三年，得法食品计划在宁波开30~50家分店。